

毛主席在“滴水洞”想些什么？

毛主席在“滴水洞”想些什么？

中国共产党 若干历史问题写真

【下 卷】

韩泰华 主编

1966年5月16日，我们随
杭州。当日到南昌住了一晚。

17日，列车直奔湖南长沙。

这是毛主席离开北京后的第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什么呢？我们揣摸不透，但无可
然，如果从农场上看，主席是要避一避这间感赋的世界。

5月18日，下午3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
处长熊根如陪我们一道参观本

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栋青瓦白墙、四角飞檐的平房，那
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主席在滴水洞居住时，由湖南省委

的坟地，山坎上
制定：房屋依山而建，房
主席住的，另一家是江

中国言实出版社
北京



毛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

张耀祠

○1号楼背着毛家的祖坟地，由坟地延伸而至，而朝龙头山，似乎也有风水先生测定。

○那时毛泽东对林彪既有些看法，又有些宠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1966年6月16日，我们随主席乘专列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杭州，当日到南昌住了一晚。

17日，列车直奔湖南长沙。在九所六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这是毛主席继1959年的第二回故乡。那一次，他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回他又要写下一些什么呢？我们揣摸不透，但是可以看出，主席是有心事的。当然，如果从表面上看，主席是要避一避这闹哄哄的世界。

6月18日，下午3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长萧根如陪我们一道奔滴水洞。

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主席的下榻处。1号楼背着毛家的祖坟地，由坟地延伸而至，面朝龙头山，似乎也有风水先生测定。房屋倚山而建。房内的会议厅，还有两套住房。一套是主席住的，另一套是江青住的。但江青从未来这里住过。两套

住房包括办公室、卧室、卫生间。从1号楼通过2号楼的回廊，有数间偏房，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1966年我随主席南巡，就住在2号楼，是跟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住在一起的。2号楼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3号楼有数层，就在进洞不远的山脚下，距1号楼和2号楼约有600米左右，是主席的警卫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

在60年代初，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〇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修成后，除个别领导同志在此小住外，一般的人不得进入。由此，本来就很神秘的滴水洞，越发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主席坐在一辆吉姆车上，我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走在主席的前面，主席的一前一后均有轿车。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后，那上面坐的是随行的警卫人员。

到了洞口，8341部队一部分进了3号楼，我和高文礼、钱嗣杰及部分警卫部队住进了2号楼，毛主席住进了1号楼，都是我们事先安排好了的。毛主席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他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当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跟我一起住在2号楼，一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同时，也作了明确的分工，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由当地警卫部队负责，内卫警卫由8341部队负责。

时值仲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萧根如处长亲自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

毛主席看见很高兴，他幽默地说：“这种‘土空气’不错嘛。”

毛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

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它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看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所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主席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他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了他给江青的信中了。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想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有 多次扫除。”他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了，他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毛主席还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久了，两三年足矣！”但那时，毛主席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然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及江青“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了，做了大量的坏事，后来毛主席也控制不了他们了。

林彪、江青是如何炮制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

刘 志 坚

○根据江青提供的情况，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批评文艺界的协会“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江青与林彪一拍即合。江青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

○“座谈会”背着党中央秘密进行。

○毛泽东对“纪要”三次修改，字斟句酌，表明了他发动文化革命的决心。

○“纪要”实施不久，参加座谈会的作者和其他二人也被打倒。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以及会后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纪要”曾被认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①，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产生

^① 《红旗》1967年第9期。

了恶劣的影响和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界和文艺界对江青召开这个“座谈会”的阴险目的，以及“纪要”的错误和流毒作了揭露和批判。1979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但是，这次“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炮制的经过情况，人们并不知晓。由此出现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和揣测。为了准确地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深刻揭露林彪、江青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我有责任将有关资料提供出来，因为我是当时参加并了解这次“座谈会”情况者之一。根据我的工作日记、回忆和有关同志的回忆，有关档案资料，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作如实的介绍，是必要的。

一、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是有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的。

首先是党内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起，经过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上当时中苏论战和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影响，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的“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1963年5月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9月制定的“后十条”，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11月，有

人向中央报告，“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1/3的问题，而是不止1/3的问题”。1965年1月在制定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时，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在九、十月间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2月，由于林彪等人制造了罗瑞卿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要夺权），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并考虑防“政变”问题。

其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问题的发端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他写条子向毛泽东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从此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接着江青发难，她于1963年5月在上海组织人写文章，点名批判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掀起了文艺界的公开点名批判运动。9月到11月间，根据江青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多次对文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说：“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推陈出新，出什么？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他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他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对彭真、刘仁写了一个批示，说：“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

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一）。根据这个批示，1964年4月，文艺界进行整风，检查问题。5月，中宣部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正在修改的时候，江青得知，硬把这个报告草稿要去送给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二）。这个批示引起了更大震动，文艺界不得不再次整风，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进一步检查问题，点名批判了田汉、夏衍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8月，康生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认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借此机会，大施淫威，任意捏造罪名，点名批判了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一些尚在讨论中的文艺理论观点，如“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认为是“修正主义文学主张”，“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理论”。对文艺界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很快扩大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并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相互影响，“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党内有人认为如果说全国有1/3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那么，文艺界还要超过1/3，有的单位已经发生了“夺印”的问题。一些文艺作品被无中生有地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从1962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

批判。1964年，康生又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开始不同意，末了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2月，在上海，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未同中宣部打招呼即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彭真等人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对批判进行了抵制，中央内部分歧加深。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文艺领域的批判，成了完全政治性的问题。

尽管如此，党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还是对批判吴晗不积极。彭真、陆定一等还设法对批判运动加以约束，多方保护吴晗。知识界对批判运动也采取消极态度，进行抵制。

第三是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江青早有政治野心，要“露峥嵘”，只是没机会，她曾抱怨“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1962年后，党内在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的发展，使她有了可乘之机。她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她极力插手党的文艺工作，尽管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1962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她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要他们批《海瑞罢官》，遭到部长们的拒绝和反对。1962年底，江青以蹲点为名，到北京京剧一团搞所谓京剧革命，遭到北京市委抵制。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抢“文艺革命旗帜”，公然污蔑文艺舞台“一大、二洋、三古”，鼓吹“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

仗”。在会演总结时，周扬针锋相对地指出：“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拜师等等，本身也是对的。”下半年，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被拒绝。于是江青只好到上海找张春桥策划，由姚文元执笔。文章出笼后，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抵制和批驳。全国报纸，除上海外，没有一家及时转载。发小册子也不顺利。1965年11月下旬，罗瑞卿路过上海，江青问他，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即给我打电话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解放军报》这才于11月29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来全国报纸虽然都奉命转载了文章，但共鸣者寥寥，反对姚文，为吴晗辩护者倒不少，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的就有3000多件，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江青对此十分“气愤”，她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

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在林彪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江青就转而去求林彪。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去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题，进行政治交易。江青想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林彪也想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也明白江青的来头，因此，二人一拍即合。林彪即通过叶群为江青开座谈会进行安排。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开始。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种党内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复杂情况下，由江青提出召开的。

二、“一人谈”的所谓座谈会

座谈会是在十分秘密的状况下，采取不正常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是江青系统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名为座谈，实际上是她一人谈。整个座谈会的准备和开会都是由江青一人决定，从不征求总政的意见，也不同参加座谈的同志商量。

会前，总政治部领导和包括我在内参加会议的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

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部长的谢镗忠还正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〇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

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想法。萧华同意，亲自带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出了像“丰收舞”、“民兵舞”、“洗衣歌”等一些好的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过，并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

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

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4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

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问题。

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

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4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很少发表

^① 这封信1951年在《戏剧报》上发表过，当时题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作者的信》，其中还有一段话：“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此次，这一段没有了，题也改了。

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

江青讲话由于不准记录，除我事后让陈亚丁作了简要追记外，并没有文字记载。根据我和李曼村的回忆和陈亚丁的“追记”，以及会后整理的“江青谈话纪要”，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自我吹嘘，抬高自己

她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和主席结婚后在主席身边。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秘书，管‘外参’。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吹她如何亲自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的舞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于是她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还说《武训传》的错误也是她发现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她在上海搞的。还吹嘘她如何搞京剧改革，搞芭蕾，没有好剧团、好演员，她“象叫化子要饭似的去要演员”。说经她改革的京剧，过去的基本功都不够用了。还吹她如何和主席平起平坐。

2. 吹捧林彪

江青在谈到她搞京剧改革、抓文艺批评没人支持时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在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她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竟比地方好些。”

3. 诬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江青多次说毛主席“在24年前的讲话”“一直贯彻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